

苏联

与

“波兰问题”

(1939~1945)

吴伟 /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苏联与“波兰问题”

(1939~1945)

吴伟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与“波兰问题”: 1939~1945/吴伟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 12

ISBN 7-5012-1651-7

I. 苏… II. 吴… III. 苏联-对外关系-波兰-研究-1939~1945

IV. D85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83573 号

苏联与“波兰问题”

SuLian Yu BoLan WenTi

责任编辑	郑志国 巫迪
责任出版	夏凤仙
封面设计	孙 旻
责任校对	未 言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电话	北京东单干面胡同 51 号 (010) 65265928
邮政编码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科
印 刷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开本印张	850×1168 1/32 15 印张
字 数	366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一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吴伟同志的《苏联与“波兰问题”》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展开研究分析，从战争背景、进程，苏波双方以及反法西斯主要盟国之间的关系等方面，描述了自1939年9月“波兰问题”的产生到1945年9月基本解决的过程。本书是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关于苏联与“波兰问题”的专著。

本书尝试采用综合、系统的方法，把纷杂的“波兰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力求探寻其中各个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本书重点分析了苏联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总体思路和解决方案的基本框架。通过这一事例，对认识苏联从战中到战后初期转变时期的政策走向和对某些重大国家问题基本态度的确定，都会有所帮助。

本书主要特点有：

第一，本书将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主张和政策放入一个框架中，集中研究这个框架是如何从酝酿、补充、变动、定型到逐步落实的。采用这种方法研究苏联的政策，是本书的独到之处。这为发现和认识苏联对外政策中最本质的方面提供了可能。

第二，本书应用了大量俄罗斯和西方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这些材料在多方面是鲜为人知的。把东、西方

有关的新材料结合在一本专著中，目前在国内外学术界尚属仅见。

特此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李静杰

2001年10月16日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波兰问题是世界现代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学术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开始是以德国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开始的,另一方面,作为东欧重要国家之一,苏联不仅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形成了一系列遗留问题,而且苏联对东欧政策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对波兰政策上。此外,战后的波兰问题,东西方国家在战后东欧政治、经济走向问题上的斗争也与战争期间出现的波兰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搞清楚1939~1945年期间的波兰问题,不仅对于准确、深入地了解当时的事变,而且对于把握战后东欧问题的来龙去脉有着重要意义。

本书使我国国内第一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与波兰问题和苏波关系的比较详尽、系统的学术专著。作者长期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现代国际关系史研究,掌握了相关问题的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

从本书书稿来看,这是一部较成熟 在学术上有较高水平的专著。本人愿意推荐本书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郑羽

2001年10月16日

单位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关于苏联与“波兰问题”的专著，专著将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主张与政策放入一个框架对 1939～1945 年期间的波兰问题进行研究，对于把握战后东欧的来龙去脉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本书使用了大量俄罗斯和西方最新解密的鲜为人知的档案材料，并将东西方有关新材料集中在一本专著中，这在国内学术界尚属仅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学术委员会
2001 年 11 月 16 日

前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战争,是世界现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对当代人类社会仍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希特勒德国发动侵略战争开始,到战争结束时雅尔塔体系的确立,“波兰问题”贯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

“波兰问题”(the Polish question 或 Польский вопрос)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包括领土、政府、民族、武装力量以及波兰内部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相互关系等各个方面。“波兰问题”的核心是波兰在驱除法西斯占领者后如何复国。也就是说,波兰在战后要在什么样的地理范围内成为一个具有什么政治属性和对外政策倾向性的国家。由于波兰的边界和领土完整早在本次大战之初便遭德苏两国破坏,原为波兰公民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族居民被并入苏联;波兰政府先是在巴黎、后流亡伦敦,而在以后的时间里,在苏联和在波兰国内又形成了与之相对立的政治中心,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战后波兰的边界、领土、居民、国家性质与权利问题,不仅与苏联和德国直接相关,也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和结果联系在一起。只有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才有可能把上述意义的“波兰问题”的解决提上日程。这样,“波兰问题”最终解决到何种程度,最后解决成什么样子,势必要依战争的结局而定。因此,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波兰问题”解决的大前提。不管是流亡国外的波兰政府,还是在国内坚持抵抗的地下政权,它们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度,在战争中的实际表现和它们的武装力量做出的

贡献,既与战争的最后结局有关,也同时与波兰未来的命运有关。

“波兰问题”还是一个国际问题。“波兰问题”的形成绝非波兰一国所为,它首先是国际力量作用的结果。同时,波兰的反法西斯战争离不开同盟国的支持与帮助,波兰的领土和边界与德国和苏联相关,而波兰政府组成及复国又与苏、美、英三国各自关于战后安排的政治考虑相联系,所以它不仅与战争联系在一起,而且还与其他国际力量的利益联系在一起。无论是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波兰问题”重要性的角度,没有其他国际力量的参与,“波兰问题”就难以解决。这与“波兰问题”形成的道理是一样的。作为一个与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的重要国际问题,反法西斯国家、首先是反法西斯主要大国的介入并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是必然的。因此,“波兰问题”也就会成为大国政治棋局上的一粒有分量的棋子。这种分量,不仅在于波兰在历史上欧洲的政治安排中不止一次成为焦点,而且还在于它同时牵涉到苏联和德国这两个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国家。

对这样一个复杂而且包容范围很广的问题,简单的、单线式的研究显然是不够的。这其中有三条基本线索不能忽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展开;大国作用,首先是苏联在解决此问题上作用的增长;波兰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以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只有在这些线索的相互交织、错综复杂的联系中,才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问题”的解决过程进行比较接近事实的描述。

“波兰问题”与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和反法西斯大国的参与这两个因素息息相关,它们决定了“波兰问题”的性质和解决的总趋势。“波兰问题”是随着法西斯德国的侵略开始出现的;它的解决过程及最终结果又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联系在一起,这就使“波兰问题”首先具有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性质。驱除法西斯占领者和恢复波兰国家的自由独立是这一性质的集中体现。与

历史上任何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运动一样,“波兰问题”的这种性质也不是抽象的、孤立的。我们无法也不应该脱离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大环境去理解“波兰问题”的这一性质。同样,“波兰问题”也只有适应反法西斯战争发展的总趋势和总形势才会得到解决。因此,法西斯集团和反法西斯集团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法西斯阵营内部各大国之间对战争进程、特别是欧洲战场局势的影响和作用的消长,都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往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在“波兰问题”解决过程中会发现这种现象,即如果用纯粹的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标准去衡量,某些结果很难说与“波兰问题”的性质相符,但事实上问题就是这样解决了。对此,我们应该冷静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

“波兰问题”的解决方式和基本时间表,也受上述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苏美英的合作达到了很高的程度。这是与共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要求。在与战争尤其是与战后安排相关的“波兰问题”上,尽管它们有分歧和矛盾,但仍愿意并且实现了合作。它们通过双边和三国会晤,在“波兰问题”上达成了协议,正是这些协议为解决“波兰问题”制定了原则,奠定了基础。“波兰问题”的解决进程也基本上是按大国政治家们的安排发展的。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波兰问题”的解决包含了强烈的大国强权政治成分,在“波兰问题”的某些方面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苏联在解决“波兰问题”的整个过程中起着特殊作用,发挥了首屈一指的影响。在苏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后,随着它在战争中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日益提升,它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影响逐渐增大,并成为解决“波兰问题”的主导力量。它在如何解决“波兰问题”上,形成了相互关连的一整套主张和计划,这些主张和计划构成了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可以说,“波兰问题”的解决过程,基本上就是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框架被接受和落实的过程。

这里所说的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并不是一份现成的文件。它是对苏联在这一问题上的几项基本原则性主张及计划的综合概括。这些主张包括：波兰的武装力量应与苏联红军一起投入苏德战场的军事斗争；已由苏联法律认定的苏波边界即大体上的“寇松线”应予以承认和保证；波兰战后的西部疆域应包括历史上属于波兰、后为德国占有的土地，即波兰的西部国界沿奥得河—西尼斯河划分；波兰必须要有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苏波两国应为防止德国的再次侵略结成联盟。

这些主张之间彼此关连，相互支撑，构成一个整体。波兰与苏联并肩战斗，这是解决“波兰问题”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奠定战后苏波友好与联盟基础的主要基石之一；苏波友好关系只有在尊重各有关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才能稳固，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归并和苏波沿“寇松线”建立边界，就是符合上述民族利益的体现；苏联希望看到波兰成为一个强大、独立、对苏联友好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的波兰对苏波反德联盟具有重要意义；在波兰失去东部领土后，波兰需要借助削弱德国来壮大自己；而收回直至奥得河—西尼斯河一线的领土，使波兰的整体位置向西移动，对巩固苏波反德联盟和壮大波兰都有益处；而上述哪一项缺少一个对苏联友好的政府都难以完成。苏联领导人在多种场合明确阐述了这些主张，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也从中看得很清楚。实际上，这些主张已经形成了一条总体思路，一个由明确的主张和逐渐具体的计划构成的框架。尽管这一框架没有用一份文件完整、清晰地加以描述，但仍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据对它进行这样的概括。

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从酝酿、定型到落实，有一个过程。它先是借希特勒德国发动侵波战争之机，用武力强行解决了归并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确立新的苏联西部国境线问题，然后又动用苏联国内法律对此加以肯定。这种做法虽

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领土和边界变更，但这既没有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承认，也为合法的波兰流亡政府把苏联作为与德国并列的另一个敌人提供了依据。因此，“波兰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苏德战争爆发之初，苏联处于异常艰难的局面。苏联与波兰流亡政府恢复外交关系并缔结军事协定，使“波兰问题”有可能用另一种方式解决。正是从这时开始，苏联一方面表示准备在苏波边界问题上作出一定让步，即从1939年9月的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规定的分界线，退到当年的“寇松线”；另一方面提出波兰的西部边界可以定在奥得—尼斯河。然而，苏联的这些主张不论在波兰还是在反法西斯盟国，都没有引起积极的和肯定的响应。苏联在战争中的处境，是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而随后在苏联境内组建的第一支波兰军队，未与德军作战就撤离了苏联，以及由此导致的苏波关系渐趋紧张，都使苏联认识到，要想使“波兰问题”的解决不损害苏联利益，必须要有一个对苏友好的政府。

随着苏德战场战略转折的完成，苏联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巩固提高，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行动也逐渐坚定和主动。“卡廷事件”中，苏联变被动为主动，与波兰流亡政府中断外交关系。与此同时，它大力支持在苏联成立的波兰爱国者联盟，并迅速组建起第二支在苏波兰军队，投入苏德战场作战。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苏联对改组流亡政府的态度坚定，对拟议中的针对苏联的中欧联盟和邦联保持高度警惕，随后又瓦解了波捷邦联计划。到德黑兰会议期间，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波兰整体西移的构想和东西边界的大致规划得到主要盟国的基本认同。而1944年上半年的一系列活动，都是对这一框架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也是为它的全面落实作准备。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全面落实苏联框架的开

始。苏联一方面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签订一系列协议，从法律上为落实这一框架铺平了道路；一方面利用红军在波兰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帮助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政权职能，为落实框架确立了依靠和协助力量。同时，苏联在盟国间积极工作，以尽可能减少落实过程中的阻力。1945年初，波兰临时政府成立和雅尔塔会议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使苏联框架的落实和它得到盟国承认的程度，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尽管三大国代表在莫斯科为组成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围绕对雅尔塔协议的理解和解释发生了新的纷争，但西方盟国也只能延缓苏联框架的落实时间，而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它了。而且，它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拖延时间对它们并非有利。当双方都适当调整政策后，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很快组成，并随即得到西方大国的正式承认。苏联框架中的最后一个问题——即波兰西部疆界的落实时机，在战胜德国之后也成熟了。在苏联红军占领着东半个德国，波兰政府的行政机构在奥得河—西尼斯河以东已经实际行使职权的情况下，波茨坦会议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是不出乎人们意料的。

波兰各种政治力量——包括流亡国外的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支持者，波兰工人党、社会党左派、中间党派和力量，在解决“波兰问题”上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随着反法西斯战争进程的发展和国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波兰各种力量之间的斗争、重组、政治倾向性的转变，政治实力的消长，都会作为解决“波兰问题”大棋盘上的不同棋子，发挥其应有的影响。

从1939年9月下旬就处于流亡状态的波兰政府，在整个战争期间，始终坚持恢复国家独立和1939年9月1日前边界和领土的立场，对因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造成的一切领土变更不予承认。实际上，从最直接、也是最基本的民族感情出发，它更愿意认为在这次大战中，波兰面临着“两个敌人”。虽然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不久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政府恢复了外交关系并缔结了

军事协定，但对它来说，这种联合只能证明两国政府准备在对德国战争上配合行动，它既不能打消波兰收回被苏联合并的东部领土的想法，也不能保证在打败德国之后两国会和睦友好地相处。就是在共同对德作战上，双方的合作也仅限于在苏联领土上建立起了一支波兰军队，但这支军队也没能在苏联参加任何作战行动。它的最大效用，就是把招募来的波兰居民带离了苏联。在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基本框架中，流亡政府所处的位置越到后来就越尴尬：一方面，不管怎么说，它在大战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得到盟国和国际社会承认的波兰合法政府，拥有自己的军队并在国内获得比较广泛的支持；但另一方面，由于它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与苏联对立的立场，不仅无法成为实现苏联框架的协助力量，甚至起了相反的作用。对苏联框架的敌视和抵制，终于使它彻底失去了在苏联框架中的位置，并作为一个“异物”为苏联所不容。英、美两国对它的庇护和支持都有各自的条件，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加以调整。当苏联的分量在胜利推进战争进程这架天平上越来越重时，流亡政府的分量却因它不愿意改变立场而变得越来越轻了。随着英美等西方国家纷纷承认根据雅尔塔协议组成的波兰临时民族统一政府，流亡政府也就从人们的视野里销声匿迹了。

在苏联的扶植与支持下，以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为代表的亲苏力量，在苏联框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们用积极开展对德斗争与流亡政府拉开距离，以明确支持苏联解决波兰问题的所有主张与流亡政府划清界限。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两支力量并没有联合，而是独立行动。它们的力量受种种条件限制，也不强大。但是它们最终在苏联的框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充当了解放后波兰的新主人，这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如果说“波兰问题”的解决就是苏联框架被接受和落实的过程，那么，没有亲苏政治力量的存在与配合，没有流亡政府及其力量的衰落与分

裂，这一过程也许就不是本书所要描述的样子了。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与“波兰问题”的研究，在苏联和俄罗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从大战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内又可以70年代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出版了一批与“波兰问题”有关的文章和论文集，这些文论的最大特点，就是密切配合有关“波兰问题”的官方宣传，配合形势为苏联的政策进行注解和阐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А. Я. 马努谢维奇^①、В. И. 皮切塔^②、Г. М. 斯拉文^③、Д. Г. 托马舍夫斯基^④等。在专著方面，最主要的成果要属1958年出版的三卷本《波兰史》和1965年出版的补充卷《人民波兰史纲》了。它由苏波两国众多历史学家集体编写而成，集中代表了当时两国史学界的正统观

① А. Я. 马努谢维奇的主要论著有《凡尔赛之后的波兰东部边界问题外交史》（Манусевич А. Я. К 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вопроса о восточных границах послеверсальской Польши），《历史杂志》（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1944年，第4期；《论凡尔赛之后的波兰西北部边界》，（О западной и северной границах после версальской Польши），《斯拉夫学》（Славяне），1944年第3期；《苏联和人民波兰之间争取同盟和友好斗争史》，（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за союз и дружбу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Народной Польшей），《苏维埃斯拉夫学》（Советское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е），1965年第3期。

② В. И. 皮切塔《波兰土地在波兰国家内恢复统一》（Пичета В. И.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е польских земель в Польском государстве），莫斯科1945年。

③ Г. М. 斯拉文的主要论著有《苏波关系史（1945年1月～3月）》（Славин Г. М.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январь-май 1945 г.〉），《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59年第8期；《为执行克里米亚会议关于波兰的决议而斗争》（Борьба за выполнение Крымских решений о Польше），《斯拉夫研究所学报》，1961年第22期；《人民波兰边界的确定》（Из истории установления границ Народной Польши），《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60年第6期。

④ Д. Г. 托马舍夫斯基《苏联为人民波兰国家得到承认而斗争》（Томашевский Д. Г. Борьба СССР за признание п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65年第8期。

点,相对以前苏联出版的波兰史,容量增大,内容更加丰富;但对一些涉及苏波关系的重要问题,如合并西白俄罗斯和西乌克兰、“卡廷事件”、对雅尔塔协议的解释、逮捕波兰国内反对力量等等,或是囿于传统观点,或是继续采取回避政策。这种官方史学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苏联在涉及波兰问题上的一切主张和做法,都是正确和公正的。即便是在赫鲁晓夫大张旗鼓的非斯大林化时期,苏联领导人以及学术界都没敢触动斯大林时期埋在苏波关系领域里的那些“敏感神经”^①。

在第二阶段,虽然官方史学的禁锢没有破除,但对苏波关系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还是有所深入。这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出版了一批史料,二是出现了以卫国战争时期苏波关系为对象的专著。由苏波两国历史学家联合编辑的多卷本《苏波关系历史文件和材料》^②,涵盖的时间跨度从1917年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汇集了大量第一次公布的文件和材料,尽管今天看来这些文件材料是经过严格选择的,但它的系统性和内容的丰富仍是空前的,特别是把大量的波文材料译为俄文,有利于材料的共享与交流。其他一些文件材料,也从不同角度扩大了“波兰问题”的研究基础。最有代表性的专著首推瓦·谢·巴尔萨达诺娃的《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苏波关系》和E. P. 库茨

① 现有档案证实,早在1959年3月3日,当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谢列平,曾亲笔致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告知1940年枪毙波兰战俘一事,并详细描述了被枪毙人数及地点。见《祖国历史》1995年第4期。

② 苏联外交部编《苏波关系史文件和材料》1~10卷(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Том I—X),莫斯科1963~1977年。

的《1941~1945年苏联为争取波兰问题的民主解决而斗争》^①。巴尔萨达诺娃是这一阶段苏联研究苏波关系问题的代表人物，她在这一领域著述颇丰。在本书中，巴尔萨达诺娃利用俄文和波文材料，对战争中的苏波关系进行了全景式的描述与分析，在系统、全面上达到了新的水平。E. P. 库茨的著作篇幅不大，撰写的视点相对集中，侧重于国际关系领域内围绕波兰问题的斗争。这两位学者著作中的共同缺憾，就是他们都只是在官方划定的框框内进行了挖掘和分析研究，而没有、也不可能突破这个框框。

对上述框框的突破，是从第二时期开始的。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起，俄罗斯陆续解密和编辑出版了大量历史档案，其中包括涉及到三四十年代苏波关系的数量众多的文件档案。这些文件档案主要收入在几本专题文件集中，如反映大战前夜国际关系复杂情况，包括苏联与英法、与德国在涉及波兰问题上的外交活动情况的文件和材料^②；涉及卫国战争期间苏波军事合作情况的专题档案集^③；反映对波兰战俘处理及“卡廷事件”详细过程

① 瓦·谢·巴尔萨达诺娃《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年代的苏波关系》(В. С. Парсаднова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莫斯科1982年；《波兰民族战线的形成(1944~1946)》(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фронта в Польше. 1944—1946)；E. P. 库茨《1941~1945年苏联为争取波兰问题的民主解决而斗争》(Куц Е. Р. Борьба СССР за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е решение польского вопроса. 1941—1945)，基辅1984年。

② 苏联外交部《危机的一年。1938~1939。文件和材料》(Год кризис 1938~1939 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2卷本，莫斯科1990年。

③ 《俄罗斯档案第14卷。伟大的卫国战争第3(1)。苏联和波兰：1941~1945年军事同盟史。文件和材料》(Русский архив 14. Велика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война. 3(1). СССР и польша 1941—1945. К истории военного союз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莫斯科1994年。